

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西学译介的开启

周岩厦¹, 商颖¹, 张光琪²

(1.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 杭州 310023; 2. 浙江省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校长办公室, 浙江 仙居 317300)

摘要: 通过史料挖掘与整理的方法,就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西学传播的途径与内容进行论述。重点阐述其西学译介活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促进中国士人“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形成,启迪其民主意识,引导国人开启西学翻译的历史并助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变革。这些符合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 西学译介;新教传教士;中国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H315.9;B97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1)05-0352-06

On Protestants and their beginning of Western knowledge translations in modern China

ZHOU Yan-sha¹, SHANG Ying¹, ZHANG Guang-qi²

(1.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Xianju Secondary Technical School, Xianju 317300,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first dissertates the approaches and contents of Wester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pioneered by the early Protestants to China through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document exca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then focuses on expatiating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knowledg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worldview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enlightening their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guiding Chinese people to initiate their history of Western knowledge translation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hich met the objective demand for Chinese modern historical progress.

Key words: Western knowledge translations;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hina's modernization

晚清西学译介活动,是在中国人蔑视西方文明与漠视基督教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在客观上,对中国人向外寻求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寻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引导意义,符合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客观需要。

收稿日期: 2010-12-17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07B35)

作者简介: 周岩厦(1964—),男,浙江省杭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1 西学译介活动的缘起

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 1807 年抵达广州,为新教来华第一人。至 1851 年,共有 19 个欧美差会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总计达 150 人^{[1]Vol. 20:513-519}。但由于清廷的禁教政策、朝野的华夷观念及民众对基督教的冷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传教活动举步维艰。他们在逆境中摸索出:引荐西方史地科技知识,开阔中国人的视野,破除其上国心态,重新确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使其能主动接纳西方文明,以利于基督教传播与对华商业活动的开展。

1815 年 8 月,米怜在马六甲发行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认为世人“不可只察一地之物、一地之人,必须察世俗万有的人道,而后才能明是非”,期望以该刊的易读易晓,达到浅识者明白、愚者成智、恶者改善、善者进德的目标^[2]。

1833 年 8 月,郭实猎在广州刊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旨在“向中国人展示,西方国家是先进文化的源泉之所在,尤其意在劝使中国人相信西方文明的正确性”^{[3]96}。他强调中国人应该“多闻”“好学”,善待异邦远人。

1834 年 12 月,在华传教士与部分在华西人在广州成立“中国益智会”,利用“知识大炮”向中国人传递“西方近代发明与发现的丰硕成果”及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3]94};“将古往今来累积的丰富知识宝藏奉献到这个伟大民族面前”^{[1]Vol. 4:354},以“使该国民众熟悉西方国家历史、艺术、科学等,并了解其价值和作用”^{[1]Vol. 7:405}。

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西方新教各教派来华传教士粗略掌握汉语知识后,即着手西方知识的汉译工作。自 1810 年至 1867 年,在南洋与在华新教传教士中文著述及期刊达 808 种,其中西学知识译介 127 种,涵盖历史、地理、天文、经济、政治、数学、物理、医学、风俗、道德及语言诸方面^{[4]288-313},著述丰硕的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为马礼逊、米怜、麦都思和郭实猎,鸦片战争后主要为合信与伟烈亚力。

2 西学译介主要内容

2.1 史地知识

在期刊方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连载米怜的《全地万国纪略》与麦都思的《地理便童略传》,从地理意义上介绍各国情况,后来分别编成小册子发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辟有地理专栏,共载世界地理类文章达 35 篇,主要介绍东南亚、南亚和欧洲各国^{[5]17}。

著述主要有郭实猎的《万国地理全集》、裨理哲的《地球图说》、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及罗存德的《地理新志》。《万国地理全集》1840 年出版,约 11 万字,分自然地理与区域地理。该著作对晚清中国地理学之影响,远远超越 1623 年刊行的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它把最新地理观念、知识及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介绍给中国,详实地向中国人展现了一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全新世界图像。《地球图说》1848 年在宁波出版,1856 年扩版并易名《地球说略》。该书图文结合,内容阐明扼要,是晚清东传中国的西方地理学译介中第一部以整个地球为描述对象的简明读物。《地理全志》1853 年至 1854 年在上海出版。作者在绪言中批判了中国的地理学与地理观,认为“西洋之讲地理,乃为独得正宗”,今日借通商传教之便“广喻斯人,中华为天下之一隅,昔之文士不能深探其秘”,建议中国士人“宜知斯理”,并“咸当童而习之,详加推阐”^[6]。该书共 365 页,上卷论五大洲,下卷论地质、地势、水文、生物及人类等。《地理新志》1855 年在香港出版,内容共分为 5 个部分,先后为序言、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书后为 3 幅插图:西班牙地图、葡萄牙地图及火轮机图。

历史知识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刊登,分 11 次转载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东史为中国史,始于盘古开天辟地迄于明亡;西史为西方古代史与英国王朝史,起自上帝创造天地迄于英吉利、哪耳慢朝。上栏为东史,下栏为西史,一如序言所示:“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和合,读史者类,由是可观之。……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明睿知之人,孰为好学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也。尽究头绪,则可看得明白。”^{[5]4}后刊出《史记和合纲鉴》,进一步说明:“自盘古至尧舜之时,自亚坦到挪亚,东西记庶乎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5]252}

史学专著为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1838 年刊出，上下 2 册，以叙述欧洲历史为主，对中国历史论述仅涉及上古时代及在“罗马东方之史”中仅述“罗马国之修道士等至中国，取桑果蚕虫返本地，教人丝务也”^[7]。作者大幅介绍希腊与罗马帝国的历史，显然是出于昭显这两个西方文明古国与中国同样拥有悠久的文明史。

2.2 天文知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文常识系列文章刊登在第 2、3、5 卷，旨在与中国人的传统天文学知识即“关于神与宇宙的错误观念”对抗^[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出的天文文章大体上是用当时欧洲天文学简述文章标题所列出的概念。

天文学著述主要有哈巴安德的《天文问答》、合信的《天文略论》、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谈天》等。《天文问答》1849 年在宁波出版，分 22 回，以问答形式进行简述。《天文略论》1851 年在广州出版，论述太阳、地球等天体运行情况，是晚清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著作。该书对 19 世纪 40 年代前西方天文学的成果进行了全面引介，并从科学的角度委婉地批评中国“天圆地方”“扫把星”及“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传统观念。《平安通书》为麦嘉缔创办，从 1850 年到 1853 年每年出 1 册，共 4 册，主要为天文、气象常识。《谈天》是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译著，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的《天文学纲要》，1859 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谈天》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介绍了天体测量方法，天体力学基本理论，太阳系结构和天体运动规律；恒星周年视差、光行差、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新发现；以及赫歇尔父子对双星、变星、星团和星云的观测结果。《谈天》首次向国人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全貌，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完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天文学因之逐渐遭到淘汰。

2.3 政治经济知识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经济方面先后刊登《通商》，揭示互通有无；《贸易》专文数篇，论及大商与小贩共相辅佐；《公班衙》（即“公司”）比较具体地陈述了荷兰与英吉利公班衙的兴起与发展，直至“五印度国属英公班衙之手下”；“贸易”一文述及远商“贸易险中做”，有“保举会”担保，并介绍了“保举会”对商务、房屋、人寿等的担保办法。关于欧美政治制度，《自由之理》介绍英吉利“国家之政体”；《英吉利国政公会》具体介绍英吉利国政公会的建立，国王与国政公会的关系，国政公会分“爵房”（即上院）与“乡绅房”（即下院），两房的职权与行事规程，开会“辩论”与表决；《北亚默利加国政之会》叙说北亚默利加国不设国王而遴选统领、副统领的制度。

《遐迩贯珍》1853 年由麦都思在香港创办，至 1856 年 5 月停刊。所载内容如“英国政治制度”“补灾救患普行良法”“花旗国政治制度”及“瀛海笔记”等，都是推崇西方社会与制度的文章，旨在显示西方文明与制度的优越性。其中“补灾救患普行良法”介绍了英美各国的人身保险与火灾保险的制度，极力主张中国推行此类制度。“瀛海笔记”为一名中国人赴英数月的印象记，重点为称赞英国“民物之蕃庶”“建筑之高宏”“政治之明良”与“制度之详备”^[9]。

裨治文著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其卷之九“土产”详述美国的矿产及各种动植物的分布，显示美国物产之丰富。卷之十一“工作”以纺织业为例，描述美国经济的发达。作者认为美国工业发达，主要依赖“人力”“物本”“知识”三要素。三者之中，知识，即科技和工艺技术，尤为重要。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述：“独无知识而不能成器……如有物本而无知识，则可延他国知识者以教习焉；或有知识而无物本，亦可往别国运带焉；或有知识、物本而无人力，当以物力代之……”卷之十二“贸易”，作者通过详述美国的通商国家与地区、贸易种类、货运船只及贸易额等，展示美国外贸的繁盛。卷之十三至卷之十七全面介绍美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制度，先言“正、副统领”，由各人选举而成及其权力、选举资格和在任期限等有关规定。接着，作者叙述议事阁和选议处两院议员的来源、选举、任期、权限、工作情形等。然后简述美国察院制度，其职能是“究人因何不遵法律之故”，先后概述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巡回法院、地方法院、陪审团制及三权分立制，此外还介绍了国会权力、联邦制、分权制及州长、市长、镇长的选举等^[10]。

2.4 科技知识

19 世纪 50 年代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知识输入重心的转折点，期刊主要有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

谈》与麦都思创办的《遐迩贯珍》，刊登的文章大都取材于同时期传教士的有关译作^[11]。更多地体现在对格物之学译著的问世。

在医学方面，合信以其《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及《内科新说》四书而独领鳌头。其中《全体新论》于1851年与陈修堂共同编译出版，分39论，被国人誉为近代第一部引介西方解剖学和生理学译作。合信在“自序”中批判中医“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认为“中华大国能者固不乏人，而庸医碌碌唯利是图者亦指不胜数”^[12]。《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由合信原作，再由国人学者管嗣复润色。《西医略论》于1857年在上海出版，共3卷，上卷综述病症，中卷分部位分述病症，下卷列述方药。《妇婴新说》1858年在上海出版，为妇科与儿科专著。《内科新说》1858年在上海出版，分2卷，上卷论述病症、病理及疗法，下卷主论药剂与药品。

在数学方面，以伟烈亚力为代表人物，主要有伟氏专著《数学启蒙》与李善兰合译《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数学启蒙》1853年在上海出版，共2卷，是学习西方数学的启蒙之作。《续几何原本》1857年在上海出版，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7卷至第15卷的汉译本。《代数学》1859年在上海出版，共13卷，译自英国数学家棣么甘所著《代数入门》。《代微积拾级》1859年在上海出版，译自美国数学家罗密士所著的18卷本同名著述^{[4]173-174}。这是晚清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专著。伟烈亚力与李善兰翻译时所创立的许多汉语数学译名，一直为中国数学界所沿用。

在物理学方面，主要有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与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重学浅说》1858年在上海出版，介绍力学的由来、分类及重学的原理，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书籍。《重学》1859年在上海出版，译自英国胡威立所著的17卷著述的部分内容，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力学的第一部著作。

比较重要的科学译著还有《植物学》，1859年出版，前7卷由韦廉臣与李善兰合译，最后1卷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近代西方植物学的著作，奠定了中国近代植物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2.5 教育制度

西方的教育制度介绍首先见诸于马礼逊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但详述者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地球说略》。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一“学馆”概述美国的教育情况：“无论男女，皆三四岁入学者多”；学校众多，县、镇均有学馆，而“省中学馆，每省一二所不等”；还有“大学馆”，“所学有三：一圣文，二医治，三国中律例规条。二者不可兼得。又以三年为期。”其中“圣文大学馆”，“国内有三四十所，每所教圣文师约四五位，受业者七八十人”。“医治大学馆”，“约三四十所，每所为师者约七位，其徒数十人”。“习律例之馆”则与医治大学馆大同小异^[12]。

《地球说略》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其他地理书籍，注重对西方列国教育事业的介绍。如“欧洲概说”称：“洲内各国，俱有书院，男女皆得入院学习文艺。其大书院系成人者，或参究义理精蕴，或讨论教书精义。又有书院几所，所以教瞽目与耳聋口哑者。”“大英国图说”评述：“是国之人，最为敏达。大小书院，不计其数。凡在院者，若天文、若地舆、若算法，皆能探究其奥……书院规则，男女皆准入学，以是妇女之辈，尽多敏悟。”“合众国图说”称：“国内多书院，凡民无论男女贫富，皆准入学。以故诵读之人，较他国为多。”^[13]

3 西学译介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3.1 促进中国士人“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形成

来华传教士所引荐的西方史地知识，向中国人“展示了富有说服力的西方文明，其积累的国家实力与影响是基于基督教、科技及工业的发展”。这些有关西方强国的重要信息，“成为中英冲突期间及之后林则徐、魏源及徐继畲等官员与士人深感兴趣的知识源泉”^[3]，直接导致了中國思想界的裂变。以林、魏、徐、梁等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士人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先后编写出一系列介绍西方史地知识的舆地学著作，以期了解外部世界以达到“制夷”目的。这是一股以济世为目的，以国际知识、世界历史、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世思潮。主要代表作为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及梁廷枏的

《海国四说》。《四洲志》摘译自英国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是近代国人第一次翻译的世界地理著作。《海国图志》资料来源除《四洲志》外，主要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地球图说》《平安通书》《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等。《瀛寰志略》与雅裨理等西人的贡献密不可分^{[14]8}。《合省国说》主要参照《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

这些“开眼看世界”思想家敢于创天下之先，将目光转向域外世界，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各国情况，向昧于外情的国人展示了一个迥异的文明体系，由此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国人的全球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启蒙作用，开创了近代国人融入世界、走向近代的历史，其影响深远。

3.2 启迪中国士人的民主意识

林、魏、徐、梁在引介西方知识时，对美国民主制度先后都作了一定篇幅的介绍，其中魏、徐、梁三人明确表示赞赏。

魏源惊叹为“旷代所未闻”，叹曰：“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统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15]

梁氏写道：“予观于美利坚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16]

徐氏盛赞华盛顿乃“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耸。呜呼，可不谓人杰矣！”^{[14]16}

魏、徐、梁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介绍与赞颂，对日后维新思想的产生不无启发意义。梁氏在《合省国说》序言中着重讨论美国的政治制度，说明美国式制度已强烈震撼其思想深处。对于徐氏的著述，《北华捷报》评论：“从此书我们高兴地得知，西方自由、文明的制度，已引起这里人们的关注。”^[17]

3.3 推动国人理念的转变

近代西学东传除了在近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中国带来影响外，还表现在理念上的转变：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逐渐崩溃，国人渐知域外有文明；传统的重道轻艺观念受到质疑乃至否定，科技逐渐得到认同，并逐步由技艺转入科学引进；重商思潮和工商立国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传入引起士人开始怀疑专制体制，逐渐追求政治民主化。这一系列的变化正是来华传教士所喜闻乐见的，是其传播西学的最终目标。

3.4 引导国人开启翻译西学的历史

鸦片战争后西学传播重心转向西方科技文明的引荐，适逢其会地迎合了经过战争洗礼的中国士人提出的“用夷变夏”的思想，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展。

随着洋务事业的渐次推广，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人士认识到，技术的引进并没有伴随着科学理念的指导和传播，而中西语言不通又加深了这一层的障碍，于是着意于设立学馆以习翻译。1862年，恭亲王奕訢奏请设立同文馆，招收生员，正式开始培养翻译人才，并着手翻译外国书籍，以“应世事，济时需”，适应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的需要。来华传教士成为了这一时期翻译西方书籍的主要力量。翻译并出版的书籍分为法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医学、工商业、政治史志等。中国知识界参与西学翻译的主要为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禧、陈修堂等。其他还有如墨海书馆的蒋敦复、陈萃亭、周双庚，江浙地区的徐有壬、顾观光等，留学美英的容闳、黄胜及毕业于英华书院并助林则徐翻译西书的袁德辉。他们都是中国近代西学引进的先驱。直至戊戌维新后，国人才逐渐取代西人成为西学传播的主体。

3.5 助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改革

中国教育历来重德性轻技艺。来华传教士所引荐的德艺兼收的西式教育目标与模式为亡国灭种危机下的国人重新思考德行与技艺关系，审定科学技术在强国富民中的价值，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作用。以曾国

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主张办“洋务”、兴“西学”,以图“富国强兵”。清末官办学堂就是从洋务派办“洋务教育”开始,相继设立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学习“洋文”和“洋枪、洋炮、洋机器”的专科学校。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国际政治地位的改变,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经济领域新质的产生,以及社会风俗、思想观念的变化等,所有这些都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向教育提出了种种新的时代要求,中国教育必须相应同步地进行一种全方位的改革。1901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制度,建立近代学制,普及全民教育,改革教育行政机构等,勾画出了近代教育的轮廓,满足了社会各方面各层次对教育的需求。

4 结 语

来华传教士的西学传播恰逢其时地迎合了中国近代两大思潮的需求。西方史地知识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士人“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形成,并为他们向外寻求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提供了客观条件。科技知识的传播与中国因炮火催发的时代紧迫感而导致有识之士提出的“用夷变夏”口号的自强思潮相吻合。对于来华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现代学者王尔敏评论:“西洋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在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自19世纪以来,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熏陶与文字启示之中国官绅,多能感悟领会而酝酿醒觉思想,同时举凡世界地理、万国史志、科学发明、工艺技术,亦多因西洋教士的介绍而在中国推广。”^[18]可以说,中国的洋务事业及后来的维新运动都是早期新教传教士开创的介绍西方文明活动的后续影响。

参考文献:

- [1] BRIDGMAN E G. Chinese Repository[J]. 1832(4)-1851(20). Canton, Macao & Hong Kong, 1832-1851.
- [2] 苏精. 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00:156.
- [3] BARNETT S W, FAIRBANK J 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4] WYLIE A.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M]. Shanghai: [s. n.], 1867.
- [5] 爱汉者(郭实猎).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M]. 影印本. 黄时鉴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6] 慕维廉. 地理全志[M]. 上海:墨海书馆, 1853.
- [7] 郭实猎. 古今万国纲鉴[M]. 新加坡:[出版者不详], 1838:36.
- [8] MILNE W.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 Malacca, 1820:277.
- [9] 麦都思. 遐迩贯珍[J]. 1853(3)-1854(7). 香港, 1853-1854.
- [10] 裨治文.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M]. 新加坡坚夏书院藏版. 道光十八年(1838).
- [11] BRITON R S.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M]. Shanghai: [s. n.], 1933:35.
- [12] 合信, 陈修堂. 全体新论[M]. 广州:[出版者不详], 1851.
- [13] 伟理哲. 地球说略[M]. 宁波:华花书房, 1856.
- [14] 徐继畲. 瀛寰志略[M]. 同治丙寅重订, 总理衙门藏版:8.
- [15] 魏源. 海国图志[M]. 百卷本. 卷 59.
- [16] 梁廷枬. 海国四说[M].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板.
- [17] SHEARING H. The North China Herald[J]. Shanghai, 1850.
- [18] 王尔敏. 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序言. 林治平. 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M]. 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1981:3.
- [19] 陈绶. 西学传播与晚清社会的蜕变[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3):83-90.
- [20] 高黎平.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西学译介的本土化[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153-156.
- [21] 李广荣. 论晚清时期西学汉译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功能[J]. 山西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39-43.
- [22] 熊月之.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J]. 社会科学, 2010(4):115-122, 191.